

杜定友先生遺稿文選

(初 集)

錢亞新 錢 亮 錢 唐 整 編

一九八七年四月
南 京

杜定友先生遺稿文選

(初 集)

钱亚新 钱 亮 钱 唐 整 编

一 九 八 七 年 四 月
南 京

杜定友先生遗稿文选目次

题 签	顾廷龙(封面)
序	周连宽 (1)
序——事业是世代相承的	赵世良 (3)
序	王可权 (8)
治书生活	(17)
编 者 按	《江苏图书馆学报》编辑部 (17)
著书生活	(129)
编 者 按	《图书馆杂志》编辑部 (129)
整编后记	钱 亮 (168)
中西两柱	(173)
整编后记	钱 唐 (196)
图书资料分类法	(201)
编 者 按	《广东图书馆学刊》编辑部 (201)
整编后记	钱亚新 (235)
附录：图书馆学专家杜定友先生(传略)	张世泰 (239)
鸣 谢	整编者 (252)

记》中的有关材料与杜先生生平事迹中活动相类似的地方，加以逐条对比。由家庭、读书、从业、办学、创编专刊、学术研究，甚至对两位杜夫人的性格、治家、照顾两杜的无微不至、忠心耿耿，都维妙维肖地一一对照写来，深感人心，引人入胜。当前我们全国正在响应中央号召提倡改革引进，图书馆事业当然也不例外，而杜先生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能有先见之明，这难道不值得令人钦佩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光吗？

本文选的第二部分是关于图书分类法的。其中的一篇是《图书资料分类法》，这是杜先生毕生研究图书分类法的重要著作之一。其特点在于图书分类表的编制必须要求先分类质和类素两大要点，这样才能使类表井然有序，主次分明；才能使图书分类工作者易于遵循，从而能将千百万图书同其所同，异其所异，达到图书分类的目的，导致前后联贯，层次显然，能富于弹性、分面组配，进一步发挥其长，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分类法。这是一个新型的图书资料分类表，可惜当时未能发表出来！

虽然这真是一件无法挽回的憾事，但仍可由这几篇遗稿，以表达杜先生毕生忠诚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力图发展，推进我国图书馆学术的研究，始终如一。这部遗稿文选，并不是他的遗稿全面。因此，我殷切希望学友钱亚新父子三人能继续努力，将其所有遗稿一一整编出来。这不仅可将杜先生精深的学术思想发扬光大，而且可以启发后学，尊师重道，在两个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兹值杜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缅怀往昔，不胜思慕之情。音容虽邈，但典范犹存。他老人家将永远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榜样，敬崇的先驱！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周连宽敬识

事业是世代相承的

赵世良

一九八七年是杜定友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将出版杜老的遗稿选集。钱亚新先生提出要我为该书作序，这原是我所不敢的，因为深知自己并不具备做这件事的工力和条件。但是力辞不获，只得商量说：写点回忆文字行不行？想不到南京的朋友们竟同意了，于是只得写起来。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杜先生为图书馆事业奋斗了近半个世纪，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余生也晚，当我以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投身图书馆工作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五〇年了。作为一名后学，把我受自杜老的教益记录下来当然是应该的，因为这正是对杜老影响所及的一种真实反映。只是这种文章能不能算是序，却实在说不准。

一、

五十年代初，我在北京的一所中学里当了两年半的图书馆管理员，这是我参加工作之始。面对着几十名教员、一千多学生，我们三名管理员共有五间大厅、两万多书，要我负责。书需要重新整理，一切规章制度也都有待建立。那时虽然根本不了解这件事的复杂性，也完全不知道该怎样着手去做，但我心里却毫无惧意。当看到许多书都有丛书名时，我忽发奇想：就把它们都按丛书组织起来吧！说干就干，一下

子先把两三千册书下了架，就按这“办法”弄起来。走不通是当然的，于是我百分之百地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境地；一急之下，还真地流下了不少眼泪，但也开始知道了这事需要学习。

找来了一本“万有文库”版的王云五分类法，又买到了一本新出版的卞宝弟分类法，翻开看看，依然是莫测高深。这时有人介绍我去找当时北京市图书馆的采编部主任卢景云同志学习，卢先生是很肯帮助年青人的，娓娓谈来，问一答十。但在我的头脑里却无论如何也形不成一套系统的概念，已知者似乎件件非常重要，而未知者却又不知还有多少，因此仍然是拿不出一个整主意来。

就在这时，一本《新国手册》出现在我的面前；从此我不仅认识了“国”这个字，也知道了有那么一位杜定友先生。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重新拿起这本书来，恍如故友重逢，而对它的简要、具体、并且又非常实用这一特点，却仍觉惊异不置。想不起还有哪本书能给实际工作者们带来如此巨大的好处。这种想法究竟是出于无知还是偏爱，那就只有请别人来评论了。

这本新书真的成了我的“手册”，不，不是手册，而是一本枕边书。有功夫就打开看，看懂了自然高兴，看不懂就翻过去看下面能懂的。看的遍数多了，懂得的自然愈来愈多。而最主要的是我有了总的想法，似乎知道了应该掌握的知识与技能的范围，对未知的东西也知道如何去寻求了，于是真的有了主心骨。这有没有主心骨可大不一样，所以我说，这《新国手册》就是我一辈子图书馆员生涯的第一本引路书，而杜先生自然就是我的引路人了。

到一九五二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去学

习之前，这个小图书馆里的书已经有三万多了。我们编出了全套的卡片式目录，又给每一名学生都发放了借书证。至于全部工作细节，当然不用说，无疑全是活学活用《手册》的结果了。

二、

说来有缘。一九五七年夏，我正在苏联莫斯科图书馆学院读大学三年级，忽然听说祖国派来了图书馆代表团，而其中就有杜定友先生。后来我又充任了该代表团的翻译，于是竟有机会和杜老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九五八年，杜老和左恭等三人合写的《参观苏联和民主德国图书馆事业报告》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记的就是这次观摩，可供参考。

今年一月，我为杂志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在长者们身边——一段青春时光的追忆》，把那次给代表团当翻译的事记了下来。其中有几段关于杜老的文字，直接引在这里吧！

杜老那时年龄最长，和蔼可亲。吃饭时他很少用面包，而总是由我多给叫一份热菜。俄餐的热菜常配以少量的米饭、面条或马铃薯，吃了也能当饭的。他老人家曾风趣地说：“我的饭量是不行了，但菜量还可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杜老分秒必争的工作作风。白天参观访问，而当次日清晨再见面时，他老人家却早已把昨天的见闻整理成文字材料了。这完全是夜晚的功夫啊！此后三十年来，每当我有所松懈

时，当年杜老兢兢业业的形象总能使我悚然自警，再不敢偷闲虚度时光。

那时杜老带着照像机，我也带了一台。白天两人忙着照了无数像片，却都没做记录。等洗出来后，谁也记不清那张是哪里了，终于使一多半相片成了废品，说来真是可惜。

当时杜老翻译的苏联《图书馆藏书的组织》一书已经出版。提到此事时，苏联图书馆界的同人们十分钦佩。他们用英语和杜老交谈起来，问到了翻译该书的事，记得杜老笑着回答说：“I can。”

（我能）。

这里忘了提一件事，就是那时在南京举办的全国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刚刚结束不久，杜老为这个班讲了课并印有讲义。到苏联后，杜老曾将这些讲义分赠给我们留苏的几个同学。现在这些材料已经收入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于一九八三年正式出版的《图书馆学目录学资料汇编》一书之中了。

三、

转眼到了一九八五年，我在黑龙江省图书馆编刊物已经三年了。秋天到大连开会，住在大连工学院的招待所里。一天晚上，该校的桑健同志来看我，谈到南京的钱亚新先生正在整理杜老的遗稿，并将组织在各地刊物上发表。这信息引起了多少回忆！当即下决心积极参与，共襄盛举。桑健同志也很高兴，第二天就把钱老发起函的复印件交给了我。

回哈后，我立即直接给钱亚新先生写信建立联系；一年多来，往返函件竟达数十通，其中自然有不少是钱先生对我

序

我国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遗稿，经我的图书馆学启蒙老师、图书馆学、目录学专家钱亚新先生暨他的两位公子钱亮、钱唐同志的精心搜集、整编、誊写成稿后，将文稿交给我，要我从八十年代的一个图书馆工作者的角度，为这部遗稿写一篇序文。我自问：无论在图书馆学的学术水平、图书馆的业务工作技能、建设高等学校图书馆的成就以及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在任何方面，都不够条件写这篇序文。但尊师重道古训，在我的心灵里，还牢记难忘，师命不可违，写出来，如有欠妥，请师批改，以求完善，未尚不可。于是将文稿全文学习通读，荣幸地成为这部遗稿的第一个读者。

1956年，杜老来南京参加南京图书馆举办的图书馆学科学讨论会，经钱师介绍，这位我国图书馆界前辈，和蔼可亲地会见了我这个刚从航空专业岗位上调来搞图书馆工作不足两年的新兵，他询问了我的经历和工作情况，向我阐述了图书馆工作的意义，告诉我在图书馆工作中有深奥的学问，给我以工作动力，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翌年，杜老二次来宁，为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讲学。因我在高校工作，未获信息，没能再见，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今天通读遗稿，似乎把我溶化在他的文字中，随着他的文字的叙述，和他一起经历着他的各个生活历程，喜怒哀乐，甜酸苦辣，有声有色，多么生动，又多么亲切，与自己三十多年建设高校图书馆的生活实践对比，给予我启迪与教育，铭刻在我的心坎。

通读结束，沉思终日，豁然开朗，拍案叫绝：杜老把自己与整个图书馆事业溶化为一体，把理论与生活实践溶化为一体进行叙述，使这部遗稿不仅是自传式的文献；而且是一部反映我国图书馆事业史近代、现代部分不可缺少的一个侧面的历史性文献；虽然论述的情节是二十年代初到五十年代后期的事，但由于我国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缓慢，许多事情至今何其相似，而杜老远见所及，提出的论点，在我们正由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化图书馆过渡的今天，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它又是一部指导我们如何建设现代化图书馆的指导性文献。

这部遗稿，值得一切具有图书馆事业心的后继者过细阅读，我想至少可从以下几方面得到教益：

一、酷爱图书馆，把一切献给图书馆事业的精神：

我从事高校图书馆工作三十多年，也参加地区和高校系统的图书馆活动。既当过学生，学习图书馆学知识；也上过讲台，传播图书馆学的理论实践经验。接触过上千位的同行，他们是馆长、部主任、组长和具体工作人员，其中确实有不少同志热爱图书馆工作，诚诚恳恳，默默无闻，积极负责，埋头苦干，做出了一定成绩，对图书馆事业有一定贡献，是我们事业的中坚。但阅读了这部遗稿，与杜老对比，似有差距。我们这些同志是具有较强烈的图书馆事业心，热爱图书馆，而杜老热爱图书馆，已把自己与图书馆事业溶化为一体，他能抛弃一切名、利、地位甚至生命，却不能抛弃图书馆事业。例如：他在《我与南洋》一文中提到：“为馆服务，专心致志。家庭经济向由内人主持，我概不过问。终日埋首伏案，不理外务，绝少交游，君子之交，无所利用，即

其他方面聘以要职，或出较多的工资，亦无不婉言谢绝，但愿终身为一馆服务，此外无他求也。”抗战八年，“余固守岗位，与中大图书生死相随。”当他在一个馆工作，由于环境所迫，不得不离职他往时，按杜老条件，完全可另谋他途，但他却易地仍操旧业。他热爱图书馆已使他与图书馆形影相连，不能片刻分离。他当馆长，一切业务工作必躬亲实践，如获心得体会，即著文以求发表，希望他馆也能分享其心得成果，他把一个馆的具体工作与整个图书馆事业联系在一起。从图书馆事业出发，他研究图书馆学的全部内容，从事图书馆学教育工作，他最早发起组织广东省图书馆学研究会，成立上海图书馆协会，以至组织成立全国图书馆协会。他热爱图书馆，热爱图书馆事业，在遗稿的字里行间均表露无遗。他热爱到了沸点，升华成了“酷”爱。说实在的：我也热爱图书馆，但与之相比，差之千里，望尘莫及，无论如何达不到酷爱的程度。我们要建设好一个馆，要推动我们事业向前发展，多么需要成千上万位象杜老那样酷爱图书馆，具有把一切献给图书馆事业的精神的人啊！

二、学习杜老毫不保守，改革创新的思想观念：

现在我们正处在由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化图书馆过渡的历史变革时期，这是形势发展对我们的要求。然而我们图书馆这个专业，受传统的“藏书楼”思想观念的束缚较严重。例如：在议论一个馆时，辄以藏书多寡，珍本、善本入藏情况，馆舍面积作为衡量标准。很少以读者范围、服务内容、书刊发挥的作用、服务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来衡量。在管理方面，往往以藏书为中心开展工作，表现在“重藏轻用”、“重管理轻服务”，各自为政地建立“大而全”、“小而

全”、“不求人”的“封闭型”的图书馆。在工作上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不计时效。对读者则认为：读者有求于我，而不是我应服务于读者。这一切都是传统的“藏书楼”的思想观念，必须破除。否则，它阻碍着我们向现代化图书馆过渡，影响着图书馆事业向前发展。

破除旧的传统思想观念，才能建立起新的思想观念，以建设现代化图书馆。这些新的体现现代化图书馆所必须具备的思想观念，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在杜老身上已有所体现，通过他数十年百折不挠地身体力行和形势的发展，历史经验证明是正确的，有无限生命力。

在他的遗稿中可以看到：他在办馆过程中，始终把满足读者的需要摆在第一位，亦即是现代化图书馆的主要特征：“一切为读者”、“读者第一”的思想观念。他提出：“图书馆服务要旅馆化，对读者如对待亲人，要啥有啥，……布置要家庭化，力求舒适；设备要机械化、自动化。”他在计划中山大学图书馆建筑时提出：“希望读者一进图书馆门，就舍不得出去，内容应有尽有，服务力求周到，明窗净几，寒暑咸宜，有足以令人留恋之处。……我理想就是要使读者处处得到安适与方便。”他考虑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无论是书刊选购、分类法的制定、目录的组织、检字、废除著者号码改用拼号方法、提议采用颜色书标、提倡开架阅览和开架外借并提出开架制度须区别对待，一律开架或一律闭架均不全面。凡此种种都是从读者需要和方便读者出发。他的“一切为读者”的思想观念指导着他的全部工作。

他的“藏书为了使用”的思想观念非常明确。他说：“藏而不用，何异藏石？现代博物馆尚且公开流通，何况是图书馆呢？”

他对图书馆的管理，非常严格，有板有眼，从不越雷池一步。他自己这样做，也要求别人这样做。然而他所制订的工作细则、规章制度的前提是从方便读者，发挥书刊作用出发。他重视管理，落脚点在于使用。

他主持一个馆，但考虑一切问题总是从整个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出发。他早在1922年就已提出统一分类法的要求，三十多年来始终为此而努力。同时还提出过统一分类编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统一分类法和统一集中分类编目与建设现代化图书馆的关系了。

关于藏书，杜老主张：“各大图书馆重点配备，各有特藏，互通有无。”这是资源共享建设现代化图书馆所需要的。

珍惜时间、爱惜生命，是杜老做事、做人的态度。他说：“生命是自己创造的，昼夜工作惟恐不及。”他每日黎明即起直至午夜，无片刻余暇，数十年如一日。他在大学三年，修完四年课程，并加修学分、获文学士、教育学士和图书馆学学士三个学位；回国后，从事图书馆事业四十年，硕果累累。他对工作人员要求也颇严格，所领导的图书馆，则欣欣向荣，生气勃勃，工作井井有条，读者盈门，门庭若市。他看了不胜自喜，认为我们的事业发展了，服务的宗旨达到了，故终日繁劳也情愿的。由此而换来了他的容貌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看来至少相差十年。他自认为：比同龄人多活十年，因为几十年来，每天多做几小时工作。这种爱惜生命，珍惜时间，办事讲究时效的思想观念正是建设现代化图书馆的必备条件，也是一切想干一番事业的人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杜老留学菲律宾，攻图书馆学，学成归国后，从事图书

馆事业，以他在国外所学所见，对我国图书馆进行改革。在改革中，不论是采访、分类、编目、典藏、流通、阅览、参考咨询的任何个工作环节，都以方便读者和我国国情的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认识拟订方案、细则，着手进行，决不生搬硬套全盘接受。因此，他对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推动作用。这种改革精神和方法，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图书馆，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杜老的“一切为读者”、“以读者为中心”的思想观念；“藏书为了使用”、“管理为了服务”的思想观念；从整个图书馆事业出发，推行统一分类法、集中统一编目，进行馆际协作、协调、建立网络化实现资源共享的思想观念；“珍惜时间，讲究工作时效”的思想观念等等，正是我们从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化图书馆过渡所必须确立的思想观念，没有这种新的思想观念，即使有全套的现代化技术装备我们的图书馆，也无法建设开放型的现代化图书馆。

三、学习杜老耿直刚强，开拓前进的优良品格：

杜老自1921年回国参加图书馆工作至1949年全国解放的三十年间，国家正处在内忧外患之际。军阀割据，战祸连绵，八年抗战，颠沛流离，既无法安居，又不能乐业，文化教育事业的提不到议事日程，何况图书馆工作？在朝者，为国家民族分忧欲干一番事业者寡；官官相护，左右倾轧，牟求私利升官发财者众。加以当时藏书楼思想根深蒂固。杜老以对事业的赤诚之心，进行图书馆改革，能不碰得焦头烂额？但他不计私利得失，无所顾忌，披荆斩棘，忍辱负重，不向左右低头折腰，耿直刚强，勇往直前，开拓前进。虽几经被

正轨，做到有条不紊流程畅通。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也是每一个图书馆工作者所应该自我培育使之具备的。

除以上四个方面外，杜老的一生，可供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他无媚颜屈膝的奴才相，有一副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在极端艰苦困难条件下，利用空隙时间，运用图片资料，举办抗战图片展览；组织全馆人员，演唱抗战歌曲，公演抗战话剧，进行抗日宣传，推广社会教育，在这些活动中，杜老自任编导，参加演剧歌唱，展示了他的才和艺。在中国文学方面：他回国初期，虽被广东旧教育界遗老们控告为“生长美洲，不谙中文”。然而他十五岁开始写作投稿，至六十二岁搁笔，留下文稿、专著、译著达600多万言，不谓不多矣。在这部遗稿中，可以看到：他文笔流畅，比喻生动，他对事、对人、对物、对己刻划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幽默风趣，妙不待言，通读全文，真是一种美的享受。岂是“不谙中文”？总之，~~在这部遗稿中~~，可供学习的实在不少，我作为这部遗稿的第十个读者，把通读学习的收获写出来，供广大读者阅读时的参考，我想也许是有益的吧！

最后应该提一下：这部遗稿是由钱师与钱亮、钱唐同志等三人，经各方搜集、整编成书的。原稿蝇头小字，文多夹杂杜老自创的简、异体字和符号，而一个符号代表一个字或词，除著者外，他人难以识别。我多次拜访钱师，总见他孜孜不倦伏案逐字、逐段，翻译推敲，整理编排，未见片刻休息，如是几更寒暑，于1985年底先后逐篇脱稿。我对年逾八旬钱师的这种精神，感佩之余，辄请他多多保重身体，注意

休息。他答：“杜老是吾师，老师文稿，学生不整理谁整理？现杜老已逝，其门生在世者，除我外已不知有他。所谓传道授业，应将老师有用的东西整理出来，传于后世。孔子、孟子自己并无文字著作留下来，所谓‘子曰’、‘孟子曰’，皆是其弟子为之整理的。”

我们应该感谢钱师、钱亮、钱唐，花了那么多心血、时间，为我们整理、编辑这部遗稿，使我们从中获得教益和美的享受。

同时，我也从钱师为杜老整编这部遗稿中，得到了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自己老师的著作与文稿。这是我的又一收获。

王可权

一九八七年元月于南京

以本刊乐于带头发表这章的第一节以饷读者而供参考焉！

× × ×

提起“我与图书馆”，好象结有不解缘，也许三生石上，早已注定的了。要说明这段“姻缘”，不得不回述十四年前的事。

（一）我们的订婚

那是1918年的时候，当时中国的社会，还是在新旧过渡的时代。所以我们的订婚，也是只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在未订婚以前，与图书馆女士从无一面之缘。她的才貌德性如何，我全不知道，就是我的父母师长，对于这位女士，也不甚了了。因为在当时，在国内并没有图书馆学这一回事、学校中虽有一个藏书楼，也是终年深居简出，所以绝无见面的机会，不过知道她是系出名门、家学渊源，将来总还不错，所以就贸然行三书六礼。那时，我还在中学念书、到中学将近毕业的时候，我所急切要解决的是谋生问题，面对于将来的择偶婚姻问题——入大学选科和毕业后职业问题——我都无暇过问。不过，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却也不妨服从长者之命，终于我们订婚了。

前面已经说过，当时中国的社会还是半新不旧的社会，所以我们订婚之后，就可以自由交际，不比以前完全旧式的制度了。我们初次会面之后，彼此就一见倾心，我看她容态慈祥，温文雅尔，而且满腹珠玑，博古通今，不由不令人景仰！她虽是大家闺秀，但是绝没有饱吃懒做的习惯，也不象多愁善病的旧式女子。她深知人生在世，不能只知自求温饱，而应为社会服务；而且觉得世事沧桑，一切都是过眼云